

桐城派:清代江南文化的引领者^[*]

卢 坡¹, 江小角²

(1.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2.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桐城虽非江南腹地,却与江南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江南政治教化的施行者,桐城张氏以及方苞、姚鼐众多弟子、友人接续在江南为官,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教化之风;姚鼐主讲钟山书院二十余年,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及东南,桐城派作家可视为江南人才的培养者;《古文辞类纂》的编纂和刊刻、流传,对归有光的追认及对阳湖派的导引,桐城派三祖等成为江南文脉的继往开来者。就此而言,桐城派堪称清代江南文化的引领者。

[关键词]桐城派;江南文化;引领者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8.014

江南,从字面意义上看即长江之南,其范围广大,长江中下游以南、五岭以北的辽阔地域皆可称之为“江南”。在早期,江南与塞北、西域、中原等地理名词相似,皆用来表示特定的地理方位。由于江南的范围过大,其内部各地的社会经济、民俗文化差异明显,唐时即以今天的闽、浙二省及苏、皖南部为“江南东道”,余下则为“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宋代以“路”代“道”,其“江南东路”以江宁府为首府,宣、歙等地皆为其辖区。明末顾炎武等曾提议“联苏、松、常、镇,并浙之嘉、湖、杭、严八府属一督抚以保江南腹心”,将苏南、浙西视为江南“腹心”。^[1]可见,无论是地理方位意义上的“江南”,还是行政区划层面上

的“江南”都是不断变化的。现代学者对此问题亦有探讨,如李伯重从“经济区域”的视角出发,指出“就明清时代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仓州”。^[2]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者则以为就空间范围言,江南有“大江南”“中江南”和“小江南”三种广狭不同的指向。其中“大江南”接近“江南”字面意义上的范围,“中江南”包括“浙江省和上海市之全部以及江苏和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地区”,“小江南”则是环太湖流域的核心地带。^[3]这其中的“小江南”又与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较为接近。很显然,

作者简介:卢坡,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桐城派研究;江小角,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系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研究项目“桐城派尺牘整理与研究”(2019CX040)、安徽大学大自然文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姚鼐山水游记的美学特质”(ADZWZ19-02)阶段性成果。

江南是富庶之地，正所谓“苏常熟，天下足”，同时江南亦是文化重镇，人文渊薮之区，明清时期的江南甚至被认为是文学创作最为繁荣的地区。桐城，介于江淮之间的一座小城，虽然不属“八府一州”江南腹地，但桐城隶属安庆府，而安庆府地处“九江之北，三楚之南，南滨大江，北界清淮”。^[4]清初的苏、皖均属江南省，两省“事实上盖为不可分之一文化区域也”。^[5]以江宁、安庆为中心的江南文人交往场所理应成为桐城派作家活动的主要区域，且“自明以来，安徽文人客居金陵、扬州、松江为一时风尚”。^[6]方苞、姚鼐作为桐城派创始人和集大成者，都长期寓居江宁，一大批桐城文人在江南地区为官施教布道，他们参与了江南文化的建设，甚至成为清代江南文化发展的引领者。

一、江南教化的施行者

张英《龙眠古文初集序》说：“桐邑居大江之北，其地介吴、楚。其县治倚龙眠山麓，岭岫绵亘，百泉奔汇。其山之秀异特出者，则又有二龙、浮渡、白云诸峰，雄奇崢嶸，峙于境内。平湖百里，滢洄曲折而与之俱。其地灵之结聚，风气之蟠郁，洵江南之奥区也。生斯地者，类多光伟磊落之士，数百年间，名公卿大夫、学人才人，肩背相望。”^[7]这篇序言描绘了桐城境内的山水风光，其中山有龙眠、二龙、浮渡、白云等，可谓雄奇崢嶸，水则百泉奔汇、平湖百里，真是滢洄曲折。桐城虽居大江之北，却被认为“洵江南之奥区”。“奥区”即“腹地”之义，可见桐城颇有江南风物的特点。佳山水给此地带来“地灵之结聚”，而“风气之蟠郁”又使得人才辈出，地灵而人杰，这才使得桐城可以方驾江南奥区。作此序者张英（1637—1708），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官至工部、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为康熙朝名臣。张英并非一人显贵，其家族被雍正称为“江左第一家风”，且张氏弟子多学问精深，为官之余，在诗文书画诸多领域，均有很高造诣，成就斐然。翁方纲《张氏四世讲筵记恩诗序》曰：

仕宦以词臣为荣，而词臣又以讲官为尤荣也。其有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相继为之者，斯称难矣，至于祖孙父子四世相继为之者，则今桐城张氏。自大学士文端公、少宗伯药斋公、侍讲中峻公、少詹事檀庭公，接踵入直，为自古罕有之盛矣。^[8]

自康熙至乾隆朝，张氏一门四代中张英、张廷瓚、张廷玉、张廷璐、张廷瑑、张若潭、张若需、张若霁、张若澄、张曾敞等十人接踵为朝廷日讲起居注官，其中张英、张廷玉、张若霁、张若澄更是入值南书房，成为康熙乾三朝皇帝“文治策略的直接推毂者”。^[9]张廷玉历事三朝，居官五十载，执词林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纵观历史，实属罕见。尤其是他辅佐雍正皇帝，惩治腐败，澄清吏治，改善民生，促进了社会发展。“雍正帝颁布遗诏，‘命他日配享太庙’，打破了清代汉族大臣不配享太庙的朝规礼法，终清一代，也仅此一人。”^[10]除了在朝廷上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这些风雅正统的主持人，均受过张英家族的知遇之恩，他们能进入文学坛坫护卫‘清真雅正’的大纛，与张英家族实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同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英家族与清代文学风尚的内在因缘”。^[11]除“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外，张廷璐尤为值得注意，甚至和江南文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张廷璐（1675—1745），字宝臣，号药斋，张英第三子，张廷玉之弟，康熙五十七年（1718）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迁侍讲学士，此后辗转各地为学政，乾隆十年（1745），病逝于桐城。^[12]从张廷璐的生平经历看，其主要为学官，且主要在江苏、浙江等地。查《清代职官年表》，雍正七年（1729），张廷璐自詹事改江南学政，雍正十年（1732）六月充浙江乡试正考官，留任江南学政，雍正十一年（1733），迁礼部侍郎，留任江南学政。张廷璐任满两届六年，张廷玉奏请乾隆帝“另简贤员”，乾隆帝面諭曰：“江苏学政，紧要甲于天下，张廷璐久于此任，声名甚好，已著有成效矣。朕即位之初，岂肯舍此可信者而另用

他员耶?”^[13]直至乾隆三年(1738),刘吴龙代领江南学政,张廷璐回礼部左任。^[14]张廷璐三督江南学政,历时近十年。学政,全称为“提督学政”,为地方文化教育的行政长官,其职责为“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帅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15]学政三年一任,张廷璐在首任江南学政期满后,以礼部侍郎衔继续提督江南学政,足见朝廷对江南文教的重视,也颇能看出朝廷对于张廷璐督学江南的信赖。《清诗别裁集》称:“药斋公不干进,不务华,以介自矢,以诚感人。视学江苏九年,如和风著物,万类萌动,既久,士林犹歌颂之。宜发言为诗,比于水之濛濛,春之和盎,读者心醉气夷而不自知也。”^[16]沈德潜极力颂扬张廷璐提督江南学政时“以诚感人”及“和风著物”的惠政。据《(同治)苏州府志》载:“(沈德潜)为诸生学诗于吴江叶燮,燮数称之,新城王士正亦致书于燮,称许德潜诗。桐城张廷璐督学江南,尤器之。乾隆初举博学宏词试罢,三年始举于乡,年已六十六矣,明年己未成进士。”^[17]可见,沈德潜为张廷璐督学江南所取之士,两人有师生之谊。沈德潜为诗守“温柔敦厚”之教,或与受张廷璐等人影响不无关系。乾隆五年(1740),江苏学政缺员,乾隆帝仍欲派张廷璐补缺,张廷玉以张廷璐患病代辞,乾隆帝则以张廷瑑代之,张廷玉再辞,乾隆帝未允,并称:“廷瑑为人谨飭,兼能阅文,必称任使。”^[18]张廷璐连续九年三任江苏学政,这在清代为仅有之事。张廷璐在通州分设考棚,免通州士子奔波跋涉之苦,任内有不少惠政,“有相士之特识,兼有爱士之虚衷”,去任后,江阴士人建“桐城书院”

以为纪念。张廷瑑督学江苏任内,“务殫竭精力以殊别高下,较阅常至夜分不倦”,尽心尽责,故“所拔多绩学能文、能自守其业者”。^[19]张廷璐、张廷瑑兄弟二人在江苏学政任上十余年,对江南人才教化起到重要作用。

明清易代,清廷曾以江宁为中心设立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省为江苏(含上海)、安徽二省。因为历史上的合二为一和地域上的相接相邻,“江南各省士族与经商者移居江南,其中以安徽迁来者居首”。^[20]桐城文人因着舟楫之便和赴考需求,更是多有往来苏皖之间者,甚至有举家迁居江南者。如桐城方氏家族。明末避乱,方象乾与方拱乾兄弟,携家迁居金陵。方拱乾生孝标(进士)、亨咸(进士)、育盛(举人)、膏茂(举人)、章钺、奕箴——方孝标生云旅、登峰(贡生)等——方登峰生方式济(进士)——方式济生观永、观承(进士)、观本——方观承生维甸(进士)。方象乾生方帜(贡生)、方戡——方帜生绥远、仲舒(监生)、靖远、珠鳞——方仲舒生方舟、方苞(贡士)、方林。如果说方苞祖上即迁至江宁,姚鼐则在久居江宁之后,有买屋作江宁人的打算,其在《与陈石士》信中说:“鼐今年已至皖矣,而四月为冶亭制军遣人固邀来金陵,今既至矣。却便因此,思买宅为金陵人耳。”^[21]方苞因“南山集案”被捕后出仕,长期寓居京城,主要从事修书等工作,并无任职江南的经历,晚年致仕方归隐南京。^[22]姚鼐则壮年辞官,教授书院近四十年,亦无任职江南的机会。但方苞、姚鼐弟子中不少于江南任职,对于江南政教颇有助益。今将方苞、姚鼐弟子任职江南情况制表如下:

表1 方苞、姚鼐弟子任职江南简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师承	江南所任官职	任职时间	著作	备注
1	赵青藜	安徽泾县	方苞	浙江乡试考官	乾隆三年,乾隆六年	《漱芳居文集》等	乾隆元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乾隆三年充浙江乡试考官。六年,充浙江乡试考官

序号	姓名	籍贯	师承	江南所任官职	任职时间	著作	备注
2	沈廷芳	浙江仁和	方苞	巡江南道,兼理河务	乾隆八年	《隐拙斋集》等	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科,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出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八年改巡江南道,巡视山东漕运,兼理河务
3	陈大受	湖南祁阳	方苞	江苏巡抚	乾隆六年至乾隆十一年	《陈文肃奏议》等	乾隆三年充浙江乡试正考官,乾隆四年授安徽巡抚,六年调署江苏巡抚。其子辉祖,乾隆三十四年为江宁布政使,四十五年为江南河道总督,四十六年授浙闽总督,兼管浙江巡抚
4	官献瑶	福建安溪	方苞	浙江乡试考官	乾隆九年	《石溪文集》等	乾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充三礼馆纂修,授编修,九年典试浙江,寻提督广西、陕西学政
5	尹会一	河北博野	方苞	江苏学政	乾隆十一年至乾隆十三年	《尹健余先生全集》	雍正九年调江南扬州知府。乾隆十一年,提督江苏学政
6	雷铤	福建宁化	方苞	浙江学政,江苏学政	乾隆十五年 至乾隆二十一年	《经笥堂文集》等	乾隆十五年,督学浙江。十六年调任江苏学政。乾隆十八年,雷铤被擢升为左副都御史,视江苏学如故,是年冬调任浙江学政
7	陈希曾	江西新城	姚鼐	江苏学政	嘉庆十八年	《奉使集》等	自乾隆五十九年出任云南乡试副考官,陈希曾一生屡主文柄。先后典试云南、贵州、江南等乡试,提督四川、山西、江苏等学政,充任会试同考官。陈希曾历任抡才重任,执掌文事铨选大权。其选拔人才时,以经术取士。姚鼐与其信中大谈学术及士风之坏,期望其能“变今日文体使之正”,训士之时,“虽博学强识,固所贵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学,为归宿之地”,又赠以《九经说》《诗文集》
8	齐彦槐	安徽婺源	姚鼐	金匱县知县,苏州府同知	嘉庆十六年, 道光七年	《梅麓诗钞》等	嘉庆十三年召试举人,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金匱令,毁淫祠,岁旱勤賑务,擢苏州府同知

序号	姓名	籍贯	师承	江南所任官职	任职时间	著作	备注
9	陈用光	江西新城	姚鼐	浙江学政	道光十三年至道光十四年	《太乙舟文集》等	嘉庆十八年,升江南道监察御史,二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道光五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八年提督福建学政,十三年提督浙江学政,转礼部左侍郎,留学政任
10	姚莹	安徽桐城	姚鼐	武进知县,元和知县	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四年	《中复堂全集》等	道光十二年莅任武进知县,寄姚范、姚鼐著作与李兆洛,请吴德旋为《东槎纪略》作序,请包世臣为姚范作墓碑文;道光十三年在武进知县任,请方东树编校《援鹑堂笔记》;道光十四年在元和县任,周边聚集一批知名学者
11	姚元之	安徽桐城	姚鼐	浙江学政	道光十七年至道光十八年	《荐青诗文集》等	嘉庆十九年充会试同考官,提督河南学政,道光十四年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十五年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十七年提督浙江学政,十八年转刑部左侍郎,仍留学政任
12	邓廷桢	江苏江宁	姚鼐	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	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年	《双砚斋诗钞》等	道光六年,授安徽巡抚,十五年擢两江总督,十九年调两江、云贵皆未赴任,以闽防方急,遂调闽浙总督

此外,方苞、姚鼐亦有一些至交好友在江南任职,如方苞至交好友:顾琮(1685—1755),字用方,吉林(今吉林长春市)人,满洲镶黄旗。乾隆元年,署江苏巡抚,协办吏部尚书事,乾隆十一年(1746)署江南河道总督。陈鹏年(1664—1723),字北溟,一字沧州,湘潭(今湖南湘潭市)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历官江南山阳知县、江宁知府、苏州知府、河道总督。姚鼐久居江南,好友甚多,如朱孝纯(两淮都转盐运使)、朱尔赓额(江南盐巡道)父子,陈奉兹(江苏布政使),谢蕴山(扬州知府),方昂(江宁布政使),章攀桂(江宁知府),汪志伊(江苏镇江知府,调苏州,又连擢苏松粮道、按察使,后为闽浙总督)等等。特别

值得关注的是,方苞、姚鼐的弟子友人中,担任学政一职的为数不少。孟子有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23]在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中,“布政施教”两位一体,为王化之始。学界已有研究者将张英、张廷玉父子等归属桐城派,^[24]其主导的文治政令对江南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桐城派在江南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同治中兴,曾国藩有再造社稷之功,两任两江总督,其本人为姚鼐私淑弟子,兴文教、建书院,延续了桐城派在江南的政治教化之功。

二、江南人才的培养者

清史研究专家孟森曾言:“清一代学人之成

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25]江小角、徐雁平等不少学者纷纷注意到书院对于桐城派立派、传衍的重要作用,如徐雁平认为:“桐城文派能绵延二百余年,有诸多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是靠书院讲学来传衍。”^[26]很显然,此问题的相关研究都离不开这样一个立论基石:桐城派发展和传播、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流派离不开一批人才,而书院则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和途径。

关于书院,刘大櫟尝言:“近代书院之设,聚群弟子于其中,延请乡之贤大夫而去位者以为之师。虽其所学者,训诂、词章之末,非复古人之旧;而兴起后生,以师弟子传习之业,于学为近焉。”^[27]桐城派中不少文人执教书院,据统计,自刘大櫟执教歙县问政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始,到师从张裕钊主讲易州书院的齐令辰终,百余年间,桐城派作家在书院讲学的有七十余人。^[28]其中在江南地区执教书院的有刘大櫟(歙县问政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姚鼐(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沈廷芳(扬州仪征乐仪书院)、叶酉(江宁钟山书院)、王昶(苏州娄东书院、杭州敷文书院)、姚椿(松江景贤书院)、方东树(宿松松兹书院、祁门东山书院)、梅曾亮(安庆敬敷书院、扬州梅花书院)、温葆琛(扬州安定书院)、胡虔(绍兴某书院)、徐熊飞(浙江平湖书院)、顾广誉(上海龙门书院)、龙继栋(江宁尊经书院)、张裕钊(金陵凤池书院)等。实际上,桐城派文人的执教活动遍布全国,比如吕璜等岭西五家主讲广西秀峰书院等,张裕钊、吴汝纶等执教河北莲池书院等等。此

外,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都有桐城派文人执教的足迹。但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桐城派文人的执教活动是从故里走向江南,再由江南走向全国的。他们以江宁、扬州等地为根据地,再辐射全国其他地方,而突破这种地域限制的关键人物则是姚鼐。

据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可知,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借病辞去刑部郎中及现任纂修官,于次年返乡,后应好友两淮都转盐运使朱孝纯之邀赴扬州执教梅花书院。此后姚鼐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教授生涯,其中主讲扬州梅花书院三年(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主讲安庆敬敷书院前后十二年(乾隆四十五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嘉庆六年至嘉庆九年),主讲歙县紫阳书院一年(乾隆五十三年),主讲江宁钟山书院前后二十三年(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五年,嘉庆十年至嘉庆二十年)。有学者指出,“乾隆五十四年(1789),在姚鼐建立桐城派的历程中具有特别意义”,^[29]正是看到了姚鼐设帐江宁钟山书院的特殊意义。钟山书院为江宁的学术中心,甚至在整个江南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姚鼐之前,卢文弨、钱大昕等先后主讲于此。姚鼐主讲钟山书院前后二十余年,为桐城派突破地域限制,最终成为影响遍及全国的文学流派具有里程碑意义。

《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四以姚鼐为首,“专记师事及私淑姚鼐诸人”,我们以此为线索,结合《惜抱轩诗文集》《金陵文钞小传》及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汪孔丰《麻溪姚氏与桐城派的演进》等成果制表如下:

表2 姚鼐钟山书院弟子简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从学时间	从学地点	备注
1	郭麐	江苏吴江	乾隆五十四年	钟山书院	乾隆五十五年,郭麐再至金陵,姚鼐不时施以援手
2	汪兆虹	江苏上元	乾隆五十四年	钟山书院	《汪玉飞墓志铭并序》作于乾隆五十七年,汪兆虹“依依者几三年”

序号	姓名	籍贯	从学时间	从学地点	备注
3	邢晋	江苏高淳	乾隆五十四年或乾隆五十五年	钟山书院	《高淳邢君墓志铭》作于乾隆五十五年,邢晋已从姚鼐学
4	伍光瑜	江苏上元	乾隆五十五年	钟山书院	作于癸丑的《伍母陈孺人六十寿序》称“自余来江宁,伍生光瑜从余游四年”
5	陈用光	江西新城	乾隆五十八年	钟山书院	“癸丑从姚先生学,居金陵半载”
6	吴山南	安徽婺源	乾隆末年	钟山书院	《吴石湖家传》称乾隆末年吴山南就姚鼐论学
7	吴维彦	江苏高淳	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	钟山书院 敬敷书院	《吴伯知八十寿序》言“余往主江宁钟山书院,高淳吴君伯知,使其次子维彦来江宁,就余为学……及余今年,畏涉江涛,辞去钟山而居皖……”
8	胡镐	江苏江宁	嘉庆三年前	钟山书院	《陈孺人权厝志》作于嘉庆三年,胡镐从姚鼐学
9	邓廷桢	江苏江宁	嘉庆四年前	钟山书院	嘉庆四年肄业于钟山书院
10	管同	江苏上元	嘉庆七年	钟山书院	“师事最久,久亲指授,最承许与”
11	吴培	安徽婺源	嘉庆十年	钟山书院	吴培为吴山南子,嘉庆十年,学于钟山书院
12	谈承基	江苏江宁	嘉庆十年后	钟山书院	《门人谈承基吴刚周承祖阮林邀游摄山宿般若台》诗作于王文治卒后,师徒游摄山
13	阮林	江苏上元	嘉庆十年后	钟山书院	同上
14	吴刚	不详	嘉庆十年后	钟山书院	同上
15	周承祖	不详	嘉庆十年后	钟山书院	同上
16	洪钧	安徽婺源	嘉庆十一年前	钟山书院	《婺源洪氏节母江孺人墓表》作于嘉庆十一年,洪钧从姚鼐学
17	梅曾亮	江苏上元	嘉庆十一年前	钟山书院	嘉庆十五年,仍不时向姚鼐请教
18	吴德旋	江苏宜兴	嘉庆十一年	钟山书院	年近四十,始获亲谒并师事姚鼐于钟山书院
19	姚椿	江苏松江	嘉庆十二年前	钟山书院	姚椿《通艺阁诗录自序》称“丁卯别惜抱先生金陵西上,勗以杜诗之学,于是复加研求焉”
20	齐彦槐	安徽婺源	嘉庆十三年前	钟山书院	齐彦槐嘉庆十三年乡试中式,当于此前从姚鼐求学
21	罗绅	江苏宿迁	嘉庆十三年前后	钟山书院	《张母鞠太恭人墓志铭并序》作于嘉庆十三年,罗绅从姚鼐学

序号	姓名	籍贯	从学时间	从学地点	备注
22	金志伊	江苏上元	嘉庆十八年前	钟山书院	嘉庆十八年举人,受知于姚鼐
23	康绍镛	山西兴县	嘉庆十九年前后	钟山书院	“余从宦金陵,侍先生于钟山讲席”
24	吴启昌	江苏江宁	嘉庆二十年前	钟山书院	校刊姚鼐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时定本《古文辞类纂》
25	伍长华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嘉庆甲戌进士,官至湖北巡抚
26	刘钦	江苏江宁	待考	钟山书院	校刊姚鼐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时定本《古文辞类纂》
27	温葆琛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师事姚鼐、梅曾亮
28	李际春	江苏江宁	待考	钟山书院	《记江宁李氏五节妇事》言李际春从姚鼐学
29	顾乔	江苏江宁	待考	钟山书院	仙沂先生次子,见赏于姚鼐
30	余敏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为胡高望学使、姚鼐山长赞赏
31	吴翼元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肄业于钟山书院
32	张廷珏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为卢文弨、姚鼐两山长欣赏
33	张德凤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张廷珏仲子,见赏于姚鼐
34	管培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见赏于姚鼐
35	王岑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受知于姚鼐
36	陶定申	江苏上元	待考	钟山书院	增益《九经说》,补刻于江宁

姚鼐主钟山书院二十余年,江宁弟子实际远远不止此数。从上表可以看出,姚门弟子除“因属乡邑子弟而被携入门墙者”,江苏乃至江西、山西等地都有“因钦仰而归来者”,其中又以江苏为多。另外,乡邑子弟亦时时从姚鼐于钟山书院游学,如:鲍桂星(1764—1826),安徽歙县人。姚鼐主讲钟山书院,鲍桂星过金陵请业,姚鼐每邮书督学,岁时不绝。鲍桂星曾典试河南、江西,又督湖北学政,姚鼐向其推荐管同,又向其阐释“镕铸唐宋”的诗学宗旨。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方东树祖父方泽为姚鼐师,方东树与

其父方绩皆从姚鼐学。嘉庆十二年(1807),姚鼐请方东树至钟山书院教授其孙,嘉庆十五年,又请方东树至江宁通志局任分纂。姚莹(1785—1852),安徽桐城人。姚莹于嘉庆十二年“七月赴试金陵,馆钟山书院”。^[30]钟山书院一时成为皖人访学、赴考的聚集之地。旧称江南省(江苏与安徽)的英俊之才,一时多就姚鼐请益。

姚鼐长期执教钟山书院,江宁为南北要冲、人文荟萃之地,不少学者往来其间,亦时时向姚鼐请教。如嘉庆十七年(1812),包世臣“谒桐城姚惜抱先生于白门钟山书院,请为学之要”。^[31]

嘉庆十八年(1813),张祥河“赴金陵谒桐城姚姬传先生鼐于钟山书院,出诗词稿请正,先生击节叹赏”。^[32]此外,嘉庆间,张祥河拜谒姚鼐于钟山书院,其《谒姚姬传先生钟山书院》之一云:“坠绪搜求勇,方刘要替人。诸生尊祭酒,有道仰儒臣。伪体随风扫,斯文得派真。早时弃轩冕,岂为自由身。”^[33]往来学者,以获姚鼐指点和赞誉为荣。

姚鼐的弟子们亦有不少主讲各地书院,如上列举的吴德旋、方东树、姚椿、梅曾亮等都有执教经历。姚鼐有些弟子走上仕途,虽不亲自执教,却对学风的转变、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影响。梅曾亮《陈石士先生授经图记》一文记载颇为真切:

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拗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人士,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34]

陈用光(1768—1835),为姚鼐最亲近弟子之一,其嘉庆六年(1801)进士及第,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十一年(1831)任福建学政,道光十三年(1833)至道光十五年(1835)任浙江学政。陈用光“从鼐最久,师说尤为笃信”,传姚鼐德行文章不遗余力。梅曾亮此文意在突出陈用光在姚门弟子中的中心地位及传播师说之功,陈用光正是于钟山书院从姚鼐学,这也可以看出书院这种师徒授受的教育方式对于地方人才的育成之功。

我们在探讨书院教育对于桐城派发展的重要意义时,更应该关注桐城派文人通过执教书院对于人才培养的积极贡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很显然,书院培养的人才不仅仅为桐城派发展服务,从这个角度而言,桐城派中的执教者,他们的贡献又远远超出了一个文派所应有的贡献。

三、江南文脉的继往开来者

《皖志列传稿》载姚鼐弃绘事、废长短句不为,其“结于一”的即是诗文之作。关于诗歌创作,姚鼐曾言“鼐故不善诗,尝漫咏之,以自娱而已”,^[35]又言“鼐诚不工于诗”,^[36]其中虽不无自谦之言,但亦可见姚鼐于诗歌创作并不十分自得。但说到文章,特别是古文创作,姚鼐以为“闻见亲切,师法差真”,^[37]甚至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借周永年之口喊出“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38]这种对于古文的自信是诗歌创作所难以比肩的。

姚鼐表现出自觉肩负文脉传承的意识应在其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时即已相当明显。这从两个方面可以提供佐证,一是如前所论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此序作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此时为姚鼐主讲梅花书院的第二年;二是姚鼐在主讲梅花书院期间,编纂出《古文辞类纂》一书。姚鼐在此书序中言:“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语法。……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39]《古文辞类纂》选古文及辞赋七百余篇,始自战国,止于清代,凡十三类,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之极则。姚鼐对此书颇为看重,这从姚鼐与友人和弟子的尺牍即可以看出:

而《古文辞类纂》,现亦在方处钞写,伊明年必携入都。都中如有能共刻之者,固佳矣;不则仍要齐五六家于南京刻亦可,须方世兄总其成耳。^[40]

《古文辞类纂》八本寄来,可查收。此书附鲍庶常入都之便,伊至可见,以知鼐近状也。^[41]

鼐纂录古人文字七十余卷,曰《古文辞类纂》,似于文章一事,有所发明。恨未有

力，即与刊刻，以遗学者。^[42]

闻时取鼐所为《古文辞类纂》观之，管子取老马之识途，仆庶几可比于此乎？^[43]

所编《古文辞类纂》，陈石士处有钞本，恐一时未便刊刻。若希甫就钞一部，带回湖、湘，或未必无益于学者耳。^[44]

从上面尺牍可以看出，姚鼐积极传抄、谋刻此选本，将抄本寄给陈用光、姚椿、孔广森等弟子，希望诸弟子传播此书。姚门弟子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纷纷以校刊此书为己任。如世传“康本”，即由李兆洛精校，康绍镛出资刊刻；“吴本”则由梅曾亮、管同、刘钦校讎，吴启昌刊印。姚椿《古文辞类纂书后》称：“始惜翁先生为此书成，门弟子多写其目，或录副去。”^[45]管同则先作《题康刻本古文辞类纂》，感慨“是刻所据，乃二十余年前本，其后增删改窜抑亦多矣。又其款式批点，多校书者以意为之，不尽出先师手”，^[46]后代作《重刻古文辞类纂序》，述其与梅曾亮等“同事讐校，阅二年而书成”。^[47]此后，萧穆、吴汝纶及吴氏弟子对此书颇为推崇，吴汝纶甚至认为“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48]此书“二三百年之间，刻印之频，流传之广，实为古籍中所罕见”。^[49]需要注意的是，《古文辞类纂》的编纂刊刻地对于其流传颇有影响，其初纂成于扬州，“吴本”从事讐校的梅曾亮、管同，以及刊刻者吴启昌皆为江宁人，此书必然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

除了考察《古文辞类纂》一书的编纂、刊刻和传播，我们还想以桐城派对归有光的追认和对阳湖派的导引，来说明桐城派对于江南文脉的接续和开启之功。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归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论者又必以震川为最，岂非以其学之深、力之大欤？”^[50]这是将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等视为明代“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并肯定了归有光对于文风转变的积极作用。而实际上，归有光之

后，一直到清初，文坛并没有迎来大的收获，这在清人评汪琬《尧峰文钞》有所反映：“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祜而极弊。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琬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宋荦尝合刻其文以行世。然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本原《六经》，其气体浩瀚，疏通畅达，颇近于南宋诸家，庐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51]这段评论几乎是横扫整个明代文坛，不管是前后七子，还是公安三袁，或失之“肤滥”，或失之“纤佻”，皆非文脉正传。清初风气有所转变，又以古文三大家为代表，其中魏禧未能纯粹，侯方域则稍涉浮夸，评论者以为汪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而实际上，“琬性狷急，幼见人过，交游罕善其终者。又好诋诃，见文章必摘其瑕颡，故恒不满人，亦恒不满于人”，^[52]其文章亦未臻纯粹之境。真正在理论和创作上“接迹唐、归，无愧色”，还有待后来者。

管同《国朝古文所见集序》言：“予幼闻人言古文辞之善，或并世而数人，或数十年而一人，或数百年而后有一人。自明归太仆有光死，而世无人焉。侯、魏与汪，皆不得接乎文章之统，他何论哉？及予受学桐城姚先生，先生之文出于刘学博，学博之文源于方侍郎，是三公者，吾党以为继太仆矣。而外人谓阿其所好，或不然焉。”^[53]在管同看来，在归有光之后、桐城三祖之前，文坛处于“无人”的状态，侯方域、魏禧、汪琬皆不得接文统，只有方苞、刘大櫆、姚鼐才是接续文统之人。管同之言虽有目无他人之嫌，但揆诸桐城派作家的言论及创作情况，又几近事实。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称：“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54]刘大櫆《汪在湘文序》言：“甚矣，文之难言也！欧、苏既没，其在明代，惟归氏熙甫一

人。”^[55]姚鼐《与王铁夫》书信中言：“故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为文家之正传，而先生真为得其传矣。”^[56]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一书，于元明两代之中，仅选归有光一人，上接唐宋八家，下及方、刘。吴敏树《与蓀苓论文派书》对此揭示道：“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词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57]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首列归有光，以为桐城渊源所在。我们在论述桐城派与归有光的关系时，多强调归有光对于桐城派的影响，忽略了桐城派对于归有光的发现、接受、阐释和传播之功。

至清中后期，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一群江苏常州籍的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被目为“阳湖派”。《清史列传·文苑·陆继辂》：“是时常州一郡，多志节卓犖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间，恽敬、张惠言天下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继辂及董士锡所为文，亦拔戟自成一队。”^[58]这里说的常州包括武进、阳湖、无锡、金匱、江阴、宜兴、荆溪、靖江八县，人物则有恽敬、张惠言、陆继辂、董士锡、李兆洛等。他们亦以文章名世，推为“阳湖派”，而与桐城派相抗衡。关于阳湖派和桐城派的关系，学界讨论已多。^[59]大致而言，观点有二：一是桐城派与阳湖派实为一派，阳湖派为桐城派的旁支别系，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王先谦、孙葆田、马其昶、刘声木、徐珂、刘师培、程千帆、郭绍虞等；二是以为阳湖派已经脱离桐城派而自为一派，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张之洞、缪荃孙、姚华、朱东润、蒋逸雪、曹虹等。但无论是认为桐城、阳湖实为一派，还是分别立派，都并不能否认桐城派对于阳湖派的导引之功。

阳湖派的核心人物张惠言在《文稿自序》中曰：“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余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为时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其师刘海峰

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60]王灼(1752—1819)，字明甫，又字悔生，号晴园，又号滨麓，安徽桐城人。少居枞阳，刘大櫟甚为欣赏，令其从游八载，学锐进。乾隆五十一年(1786)，王灼中举人，选东流教谕，主讲祁门东山书院，与金榜、程瑶田、吴定、张惠言等交友善。张惠言是通过王灼习刘大櫟古文之法，稍得规矩。“后皋文学成，其论文必及悔生，‘阳湖派’由此起”，^[61]突出了阳湖派与桐城派的渊源关系。除王灼，钱伯坰亦曾向张惠言论刘大櫟古文之法，“乾隆戊申，自歙州归，过鲁斯而示之，鲁斯大喜，顾谓余曰：‘吾尝受古文法于桐城刘海峰先生，顾未暇以为，子傥为之乎？’余愧谢未能。已而余游京师，思鲁斯言，乃尽屏置曩时所习诗赋若书不为，而为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62]钱伯坰(1738—1812)，字鲁斯，号仆射山人，阳湖人，师事刘大櫟，受古文法。张惠言曾向同乡钱伯坰学书及诗，后又从钱处辗转习得刘大櫟古文之法。钱伯坰“转以授之张惠言、恽敬，遂以能文名天下。论者谓伯坰得人而授，使桐城文学大明于世，贤于自为”。^[63]这是以钱伯坰为介，转论刘大櫟对于阳湖派的开启之功。

除刘大櫟，姚鼐对于阳湖派亦颇有影响。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阳湖人，精輿地、考据、训诂之学，为阳湖派代表人物。李兆洛与姚门弟子姚莹、康绍镛等交情颇深。李兆洛曾应姚莹之请为姚范、姚鼐作传，其对姚鼐评价道“先生清明在躬，蓄云泄雨，文章为光，岳于天下”，又言“读先生遗书，求得行事始末，恨不得在弟子之列，故私录其概，时观省焉”。^[64]李兆洛又曾协助康绍镛刊刻《古文辞类纂》，而康刻《古文辞类纂》的底本即为李兆洛所藏，可见其颇为留心姚鼐之学。与李兆洛相友善的又有吴德旋。吴德旋(1767—1840)，宜兴(今江苏无锡)人。其早年与张惠言、恽敬等人切磋古文，并受到两人的推重。关于吴德旋，有人以为桐城派正宗，有人将其归之为阳湖派。^[65]张寿荣在《初月楼文钞》跋文中对此总括道：“宜兴吴仲伦初

与张皋文、恽子居切磨论难，学为古文。后于钟山见姚惜抱而受业焉。谓惜抱先生以禅喻文，须得法外意，闻之而若有证也。先生亦许谓可与言文。故其生平所极推崇者惜抱，次皋文，次子居。而于皋文、子居之文论断亦允。盖由阳湖而桐城，其中甘苦，喻之深，故能道之切。所著《初月楼正续文钞》，惜抱而后言桐城家者尚之。”^[66]可见吴德旋为文有个转变的过程，而这个转变当始自嘉庆十一年（1806），吴德旋拜谒姚鼐于钟山书院。两人相见恨晚，姚鼐“深许德旋为可与言文”，吴德旋对于姚鼐“以禅喻文”“得法外意”等论文观点颇为叹服。吴德旋曾在《与王守静论大云山房文稿书》中自述为文特点：“仆于文所见与子居异。子居为文气必雄厉，力必鼓舞，思必精刻，而仆所深好者柔淡之思，萧疏之气，清婉之韵，高山流水之音，此数者皆子居所少。”^[67]很显然，吴德旋的古文与桐城文章、特别是姚鼐文章相似，以神韵为宗，而不同于恽敬等阳湖派气雄厉、思精刻之作。

“当康熙、雍正间，方学士苞力讲求古文学法，天下始知宗尚归氏熙甫，以上追司马字长、韩退之，卓然为古文导师。”^[68]可见方苞对于归有光有推戴接续之功。而刘大櫆及姚鼐对于阳湖诸子的教授，遂使阳湖派自立于世，其导引之功，不可抹煞。此外，袁枚临终前请姚鼐作墓志，^[69]王芑孙两次作《与姚姬传先生书》，表达钦慕之情，并令其少子拜谒姚鼐于钟山书院。这都说明桐城派古文于江南逐渐被认可并传播开来。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简洁地概括出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布情况，即安徽桐城有桐城之学，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广西有桐城之学，后面又说道湖南有桐城之学，甚至认为“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70]曾国藩此序虽未明言江浙有桐城之学，但所言“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大有以江南为桐城之学的根据地意。

曾国藩这段话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为我们描述出桐城派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桐城一隅走

向江宁等地，再辐射江南，最终影响遍及全国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与桐城派作家占据江南文化高地分不开，桐城派是从江南崛起而走向全国的，从某种意义上言，江南又是桐城派的福地。从地利的角度讲，“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谁引领了江南的文化，自然也容易在全国形成巨大的影响。所谓“文化引领”，实为一种可供大多数接受的文化指向，这种指向又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姚鼐“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观点，姚莹对于“经济”的强调。此外，所谓“引领”也并非只是一时，尽管江南人物阜盛，又较早地接触西方文化，但向西方学习，大力鼓吹并传播以《天演论》为标志的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人，正是桐城派末代大师吴汝纶及其弟子严复等。民国以降，桐城派在激烈的文化运动中失去昔日的光环，但无锡国专中的一批桐城派传人，仍是江南文化中难得的一大亮点。从这一角度来说，桐城派所拥有的某些特质早已融入并沉淀在江南文化之中。

注释：

[1]〔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上，四部丛刊本。

[2]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史研究丛书总序》，见宋清秀：《清代江南女性文学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4]〔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十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229页。

[5]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1期。

[6]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7]〔清〕张英：《张英全书》，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8-299页。

[8]〔清〕翁方纲：《复初斋外集》文卷一，民国嘉丛堂丛书本。

[9]〔11〕温世亮：《张英家族与清代“清真雅正”的文学风尚》，《苏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10]〔清〕张廷玉：《张廷玉全集》，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

[12]〔58〕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1046-1047、5965页。

[13][18][清]张廷玉:《澄怀主人自订年谱》,见《父子宰相家训》,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0、298页。

[14]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44-2650页。

[15][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345页。

[16][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54页。

[17][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九,清光绪九年刊本。

[19]赵统:《江阴明清学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9-262页。

[20]罗时进:《明清江南市镇及其文学群落的形成——以空间分布、流动汇聚、环境生态为视角》,《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21][37][40][41][42][43][44][清]姚鼐:《惜抱轩尺牍》,道光三年刻本,卷六、卷一、卷五、卷四、卷二、卷四。

[22]王思豪:《方苞》,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

[2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6页。

[24]江小角、杨怀志:《张英及其诗文述评》,《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江小角、杨怀志:《张廷玉的为官之道与为文主张》,《西部学刊》2016年第1期。章建文:《论张英对桐城派的贡献》,《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25]孟森:《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50页。

[26][28]徐雁平:《书院与桐城文派衍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7][55][清]刘大櫟:《刘大櫟集》,吴孟复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0、55页。

[29]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30]施立业:《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34页。

[31]胡韞玉:《包慎伯先生年谱》,朴学斋丛刊本。

[32][清]张茂新等:《先温和公年谱》,清同治间刻本。

[33][清]张祥河:《小重山房诗词全集·诗舲诗外》卷一,清道光刻光绪增修本。

[34][清]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增补本)》,彭国忠、

胡晓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35页。

[35][36][38][56][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2、85、114、289-290页。

[39][清]姚鼐纂集:《古文辞类纂》,胡士明、李祚唐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45]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集②姚椿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46][47][53][57]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集⑤管同集、吴敏树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06、107、95、298页。

[48][清]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三),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231页。

[49]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50][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周本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页。

[51][52][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43页。

[54][清]方苞:《方苞集》,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59][65]曹虹:《阳湖文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16-128、72-81页。

[60][62][清]张惠言:《茗柯文编》,黄立新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1、71页。

[61][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彭君华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274页。

[63]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徐天祥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205页。

[64][68][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五,清道光二十四年增修本。

[66][清]张寿荣:《舫庐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07-708页。

[67]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集①姚范集、方东树集、吴德旋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85页。

[69]卢坡:《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手稿考释》,《苏州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70][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05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